

1.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阿尔伯特·伯吉森 著

胡光金 译

本文阐述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的一种新方向的四个不同阶段。这一新方向可称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其主要设想是翻转经典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逻辑，即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是决定性关系。本文通过阐释每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逻辑来展示这四个阶段中的渐进演变关系。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四个阶段是：（1）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逻辑的早期翻转(葛兰西)；（2）意识形态逻辑向下扩展，与政治逻辑融合（阿尔都塞）；（3）融合意识形态/政治领域逻辑后继续向下扩展，以吸纳经济领域逻辑(普兰查斯)；（4）将曾经由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重铸为由主体身份之间语言关系构成的新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话语构成”。（拉克劳和墨菲）。

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被翻转。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见证了一系列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不仅力图颠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还进一步认为，作为上层建筑（如意识形态和语言逻辑）是整体社会构成的逻辑。（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述，见：Anderson 1976, 1983; Carnoy 1984; Boswell et.al 1986; Wood 1986; Alexander 1982; Szymanski 1987; Aronowitz 1982; Geras 1987; Thompson 1984）。为了区别于其它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采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¹，因为它反映了文化要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比如：信仰和

¹ 最近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趋势是“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其主张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 (see: Przeworski, 1985; Elster, 1985; Roemer, 1982, 1985; Wright, 1985; Wright, Levine, and Sober, 1992; Burawoy, 1989). (原作者注)

共享的世界观，(Gramsci 1971; Burawoy 1979)，文化 (Nelson and Grossberg 1988)、意识形态 (Althusser 1971; Poulantzas 1978; Larrain 1986; Thernborn 1980)、语言 (Coward and Ellis 1977) 以及话语 (Laclau and Mouffe 1985; Ryan 1982)。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审视自葛兰西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关系的转变，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变化。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变化的四个不同阶段，从经济基础决定论起，到上层建筑决定论止。每个阶段通过讨论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阐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转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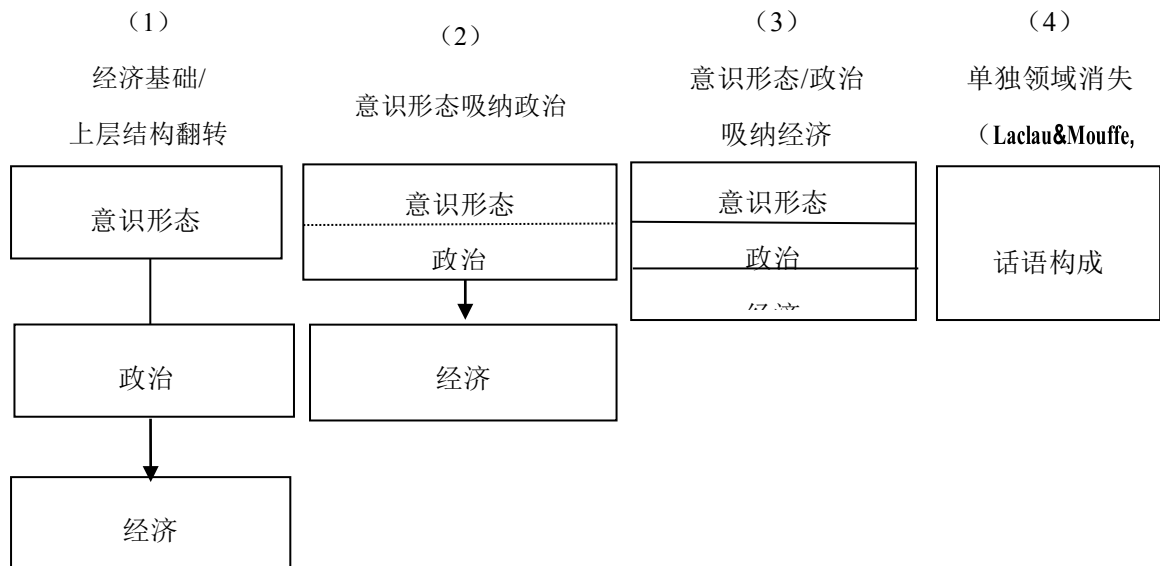


图 1.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代表人物葛兰西 (Gramsci 1971)。此时，共享的世界观决定国家宰制权，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翻转。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包含的远不止经济基础与上层结构的翻转。第二阶段，代表人物阿尔都塞 (Althusser 1971)。意识形态领

域逻辑向下扩展，吸收了国家的逻辑，创造了他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即意识形态与政治相融合为同一场域。

在此，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发展。首先，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逻辑弱化并向意识形态倾斜；其次，伴随非意识形态领域因果分析的衰弱，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逻辑融合。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像早期葛兰西理论中那样决定政治形态，而是吸收了政治形态逻辑。尽管这个新融合的意识形态/政治范畴，仍然对经济有决定作用，但是连这个区别，后来也逐渐消失。

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普兰查斯（Poulantzas 1978）。意识形态国家与经济的统一得以理论化。经济基础被吸纳进上层建筑，理论上成为一个整体。意识形态不再决定政治或经济，而是成为它们的一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实上已经超越经济基础/上层结构的翻转模式。各领域间因果关系消失，能指间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逻辑理论化为阶级关系逻辑。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决定基础逻辑，而是成为基础逻辑。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成变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成”，代表人物为拉克劳和墨菲（Laclau & Mouffe 1985）。下文阐释图 1 所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基础/上层结构翻转

第一阶段的理论转变指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的翻转。这一翻转通过改变文化、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因果秩序来实现。葛兰西（Gramsci 1971）明确声称，共享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十分重要，它像新的粘合剂一样，将社会要素黏合在一起。之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的翻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前者（经济结构）是首要的主导因素，后者（上层建筑）是次要的从属因素……在葛兰西那里，则正好相反”（Bobbio, 1987: 151）。佩里·安德森也注意到，“在葛兰西的用法里，宰制权意味着工人阶级意识形态

受资产阶级控制，而资产阶级通过意见一致来实现统治” (Anderson 1976-1977: 26)。

权力和控制不再来源于经济基础及其动力，也不再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而是源自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此刻，国家不再是“武力”和“胁迫”的机器，而是“道德”和“文化”的化身。国家创造了“被统治者的一致看法”，“这种一致看法（是）被精心组织的，而非一般化的或模糊的”。(Gramsci 1971: 259)正是对一致看法的编制和生产，把国家从原先的强迫装置重新定义为公民社会各种机构、协会以及教育实践。这扩展了国家的职能，且是一条双向通道。不仅赋予传统上不属于国家领域的各个机构重要性，更是让这些机构的文化职能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也即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文化职能相连——立法、社会化、维持道德秩序——它们成为了葛兰西所说的国家职能。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是社会化和文化传承和传播世界观及意识形态的工具。简言之，“整个国家的职能都变了‘教育者’等角色” (Gramsci 1971: 260)。对葛兰西来说，旧观念中“国家警察……职能限于保卫……公众秩序[掩饰了实际情况]，在形式制度里（作为限制性的假设，从来没有在文件之外真正存在过）属于私有力量的宰制权，经过历史发展，在公民社会也是一种‘国家’的力量，且就是国家本身” (1971: 261)。

我们首先弄清这里的意思。国家权力，作为武力和暴力，取决于公民社会普遍赞同这个基础，准确的说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这便是葛兰西式的翻转：信仰、一致看法和赞同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而非相反。

应该注意，葛兰西既谈到了国家的强制性，也谈到了国家的认同性。国家仿佛一个双面体，武力和认同是它对等的组成部分。仔细审视，却会发现它们并不真正对等。因为葛兰西的学说是“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后者[强制的盔甲]能够暂时消亡” (1971: 263)，也就是说，强制性方面居于次要地位，是可以省掉的。“受约束的社会（或伦理国家或公民社会），组成部分越来越显而易见，因此可以认为国家的强制部分会逐步消亡” (1971: 263)。根据这个

逻辑，认同的基础会加强，而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会下降，直到成为“没有国家的国家”。国家职能现在被意识形态和公民机构的社会化进程所消耗。“国家是一个复杂体，由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组成，统治阶级不仅用它来证明自己合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还用它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一致看法”（1971: 244）。统治现在被认为是生产一致意见——也即，生产信仰、同意、理解，以及各种理所当然的假设。国家是阶级国家，只是阶级统治已经转变成由“政治和文化宰制权机器”（1971: 259）创造、维持，并实现再生产的阶级认同。

具体来看，阶级统治是如何通过理念和世界观成功实现统治的呢？一种方法是让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被理解为所有阶级的利益。这一信念一旦成功，该阶级就继续拥有特权位置，而其它阶级则认为这是一种常态，且是他们可以渴求的一种常态。“资产阶级将之写入法律，继而写入国家职能的革命中，更是包含了共同意愿……”（1971: 260）。

“共同意愿”是如何产生的？国家为“大众的‘自发’赞同而进行最周详的准备，大众则需要指令中‘生存’；他们改变习惯、改换意愿、更改自己确信的事情以使得自己试图实现的目标与被给予的指令一致”（1971: 266）。那么又是什么造就了“习惯”、“意愿”、“确信的事情”，造就了“大众的赞同”？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吗？是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吗？不是。理论上说，信仰来自国家作为社会化实现者的国家，作为“教育者”的国家，作为自上而下种植大众意识的新型国家。

在葛兰西那里，从学校到私人协会等公民机构，已经将国家分散、粉碎。事实上，国家已不是国家，而只是社会的一种总体道德感。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式国家具有帕森斯式的世界观。社会控制从合法的政治结构转变成一般社会机构。理论上来说，社会有机整体（国家作为一切），已经被压进服务中，融入统治、特权，以及特定社会阶级的权力里。通过让他人信服该阶级代表了作为整体的社会构成的利益，所有这一切才得以实现。

很少或几乎没有使用强权、武力或胁迫手段就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这确实是个了不

起的成就。“国家倾向于创建和维持特定公民文化（属于集体生活和个体关系），倾向于选择性的消除某些习俗和看法，并传播服务于这种文化的另一些习俗和看法”（1971: 246），其结果，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型人类和公民[在构建中产生]复杂而明确表述的公民社会的政治形态外壳。在这个社会里，个人能够自我管理不用卷入政治社会冲突——而是成为它的正常延续，成为其有机的补充部分”（1971: 268）。但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统治，仍然意味着特定阶级的统治。社会逻辑现在合法了，因为统治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信仰）上进行，而不是在生产上进行；是通过国家，而不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阶级占有进行。

由此，在葛兰西看来，文化/意识形态不再需要解释，而是可以用来进行解释；不再是果，而是成了因。作为世界观的社会意识，日益成为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重要因素。统治和反抗都与信仰相连。资产阶级努力控制工人阶级的思想，力图使工人阶级相信他们最能代表作为整体社会构成的利益。阶级斗争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成为葛兰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地位之战”。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不仅观念领域是斗争所在地，斗争本身也日益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展开，并更加公开主导着政治和阶级斗争。对社会意识结构的控制日益成为对生产结构控制的前提。

葛兰西式的世界观，融合了过去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关系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关系。但是物质性的阶级统治，是通过观念机制而实现的。此后的新符号学马克思主义逻辑里，观念成分不断成长，物质成分则会减缩，最后达成理论一致，即阶级实际上束缚了对社会变革的理解(Laclau and Mouffe 1985)。

第二阶段：意识形态逻辑吸纳政治逻辑

随着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葛兰西开创的理论得到深化和扩展。葛兰西的关键机制在于宰制权，在于通过信仰控制社会，以及跨越阶级界限的共同世界观。宰制权发生

在国家的地缘司法边界中，但作为社会逻辑机制，它的影响更多地存在于理念领域——公共信仰——因此更多地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逻辑成为国家逻辑。这一步，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得到了清晰地阐述 (Althusser 1970, 1971; 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0; Benton 1984; Hirst 1976; Thompson 1978; McCarney 1989; Sprinkler 1987; Elliott 1987)。意识形态逻辑向下扩展，与政治领域逻辑融为一体。葛兰西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逻辑的翻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极大发展，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转变也将走得更加深远。此后的发展表明，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决定政治和经济的看法，仅仅处于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紧随其后的第二阶段中，意识将与政治完全融合。过去各个领域间的理论隔阂，让经济基础逻辑渗透进政治或意识形态逻辑——如果说这属于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话，20 世纪一切都翻转了。意识形态逻辑渗入并替换政治逻辑，然后继续渗透，并吸纳经济逻辑。

阿尔都塞在他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的理论中，阐述了各个领域的融合。意识形态加上国家：是意识形态包括政治逻辑，还是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逻辑？事实证实是后者。这个新近的融合体，其逻辑是意识形态逻辑，但并不非葛兰西理论中的信仰、赞同或认同，而是索绪尔(Saussure 1966)的语言逻辑。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马克思主义等于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将索绪尔引入马克思主义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原本分开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不仅实现了融合，还接受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逻辑。虽然没有清楚地陈述出来，但是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逻辑与索绪尔的语言逻辑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许多人批评阿尔都塞，认为他的理论太过抽象。他真正重要的论点，是将语言规则用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原理。语言结构

逻辑成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逻辑。它们的相似显而易见。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像共时结构一样运行，像极了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因此，它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实体。正如索绪尔研究语言系统的普遍理论，阿尔都塞着重于“一般意识形态理论，而不是具体意识形态理论”（Althusser 1971: 159）。正如索绪尔的语言远离日常的言语实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普通性、抽象性和结构性，远离外部现实。

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的社会系统里是如何运作的呢？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规定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存在于主体的物质性行为中，主体完全根据自身信仰而行动”（Althusser 1971: 170）。该阐述中，意识形态权力不仅仅存在于规则、规范或习俗层面上，还存在于更加基础的层面上。因为主体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会慢慢意识到各种规则和“规定”都是针对他/她而言，并适合于他/她的。阿尔都塞的机制与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 1966）的控制理念相似，即通过现实的社会建构来进行控制。在他们看来，与其说人民是通过外在制裁或规范受到控制，不如说是通过社会建构和采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的认同，而受到控制的。从社会构成的角度说，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同时也在更大范围的阶级关系里发挥作用。因此，被创造出来，并把阶级地位付诸行动后，社会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这就是意识形态对生产中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通过我称为质询或欢呼的方式‘起作用’或‘运行’，它在个体中‘吸收’主体（把他们全都吸收了），或者它把个体‘转变’为主体（把他们全都转变了）”（Althusser 1971: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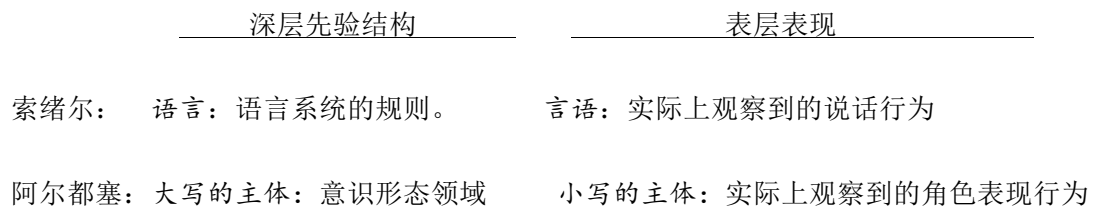
个体转变为主体的过程，与索绪尔的声音转变为所指符号的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对索绪尔来说，语言符号由两个部分组成：声音，即能指；声音所再现的思想，即所指。在阿尔都塞那里，主体和索绪尔的符号相似，再现的具体个体（就像具体的声音）和某个劳动部门的社会地位相似。这类似于规则系统中的符号位置和语言符号关系。

索绪尔：符号=声音（能指）+思想（所指）

阿尔都塞：主体=个体（能指）+社会地位（所指）

索绪尔的语言观念，是文化关系（在语言里）预先存在的系统，它使实际的语言行为（言语）在阿尔都塞那里直接类比成为可能。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预设结构，它先于具体的个体存在，使个体的社会实践成为可能。意识形态，及其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体现，像语言的深层结构逻辑一样起作用。程序固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给主体分配社会地位，就如同语言规则在语言结构中，给符号分配位置一样。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阿尔都塞的“主体”就是某种“人类符号”。主体的身份和自我理解，均来源于在其他“符号化个人”系统里的结构位置。所有的符号化个人组成阿尔都塞的社会形态。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起作用，组成整体的主体则像言语一样起作用。语言逻辑被压进服务中，成为新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社会逻辑。阿尔都塞理论体系中写大的主体和小写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完全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作为实施、表现和社会个体的主体，理论上同日常的行动、表现和说话的行为相类似；就是和言语相类似。进一步说，像言语一样，主体的行为，假定了先验语言结构的在场。或者对阿尔都塞来说，就是先验的大写的“主体”。说到大写的主体及其先验性时，阿尔都塞说“……然后，作为主体的个体质询，以某个独特或者重要的其他主体为前提”（Althusser

1971: 178-179), 他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大写的“主体”是更大的意识形态系统的一部分, 是索绪尔的更大语言系统的阿尔都塞式类比。

进一步说,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 符号受更大的语言系统控制。语言系统给符号指定位置。语言学中, 问题在于意义、意指关系和解释。固定的符号位置提供方法以控制和指定具体声音的意义。这一能力或权力, 属于更深层次的抽象语言系统及其各种规则。这是索绪尔式的语言优于言语的权力。在阿尔都塞这里, 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权力, 在社会构成的结构关系中, 给各个主体指定位置。阿尔都塞的主体“……进入实践中, 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固定程序控制。他们‘认识到’事物的现实状态 (das Besthende), ‘事情确实如此而非其他’而且, 他们必须服从上帝, 服从牧师, 服从戴高乐, 服从老板, 服从工程师……他们各自的物质性行为, 只是将祷告者令人羡慕的祷词‘阿门——诚心所愿’印刻生命里”

(Althusser 1971: 181)。此时, 阿尔都塞的言语实现着阿尔都塞语言的先验意义。此时, 社会秩序像语言秩序一样, 具有结构性的位置, 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固定程序来定义、描述或是“将主体放入”。这样的结果是, 个体通过宗教结构中 (“服从上帝, 顺从良心, 顺从教士”); 政治结构中 (“服从戴高乐”); 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中 (“顺从老板”); 或者官僚——技术结构中 (“服从工程师”) 的位置来认识自己。

从这个角度说, 社会控制来自于对自我的理解。自我作为社会对象, 与其他社会对象, 或其他“受质询的主体”相对。这个自我定义, 含义丰富。总的来说, 足以将个体限于自身的位置上, 足以规定社会秩序。定义某人为工人, 他就会表现得像工人; 定义他为老板, 他就会像老板; 定义某种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方式, 它也将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社会赋义来描述或建构的符号互动过程, 现在成了社会再生产的马克思主义逻辑。阿尔都塞真的相信人们会履行好指派给他们的工作吗? 阿尔都塞说: “的确如此, 主体‘自己工作。’这种结果的神秘性存在于最先的两个重要环节中” (Althusser 1971: 182)。一个环节是“自由

的主体性，主动权的核心，行动的执行者和负责者”；另一个环节是，“被动的个体，顺从高一级的权威，除了可以自由接受顺从之外，被剥夺了所有自由”（1971: 182）。紧随这一逻辑，如果个体被转变或重塑为主体，包括阶级主体，那么，甚至他们的思想，信仰以及价值，都将按照他们的社会自我和他们的主体性来进行定义。“致敬”的时候，有一种认识，即“他们确实占据着指派给他们的位置，一个固定的位置：‘这真的是我，我在这儿，是工人，是老板或者是士兵!’”（1971: 178）。重新生产“工人、老板”就是重新生产社会生产关系。现在，这清楚地表明，经济领域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出来的，是由上层建筑再生产出来的。

阶级关系成为符号关系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确立关系是任意武断的，二者基于语言规则而结合，这是结构语言学的理论进步。在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里，这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为什么“树”这个能指应该指称物质世界的树皮和树叶，就只是和符号有关，和这一能指在语言关系中的位置差异有关。“书”或“术”²也能够像“树”一样，用来指称木头或树皮。能指的性质与它所再现的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结构主义的伟大设想。符号的本质特征是任意武断性，主要来自语言规则，而语言规则规定了差异性、相似性、以及对立性，还规定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所有差别。阿尔都塞的符号系统逻辑已暗中用到了社会构成中，所以，社会阶级关系现在被看成是符号关系。

外部指示物将社会从物质世界脱离出来，所以，取消它对符号位置的决定性，进而消除它对语言关系的决定性，是合适的；而消除它对社会地位，进而对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却

² 原文为发音与 tree 押韵的 pree 和 flee. (译者注)

是不合适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及普通的社会学分析那里，外部指示物属于物质生活，是不属于社会的外部自然事实，它存在着，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生产方式、特别是不属于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然而注意这个事实，一旦这个不属于社会的外部指示物不再存在，物质条件的作用，比如生产力的变化，作为影响社会变化的因素也将不复存在。如果现存的意识形态不再能够形成主体，那么决定主体地位的现实世界，集聚经济阶级的各种主体都将被移除。社会构成的外部指示物就是物质世界和大自然的真实世界，社会在其中生长、进化，并系统性地互相作用，生产和再生产个体成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也许外部指示物并不决定符号的本质特征，或者符号在语言中面对面的相互关系，但事实上，物质世界确实是决定了主体的本质特征及主体的社会关系。在这点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逻辑，已悄然成为社会构成的符号理论逻辑。

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政治逻辑吸纳经济基础的逻辑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逻辑里，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有效融合，并共同决定了经济逻辑的再生产。下一阶段，已经融合了的意识形态/政治领域将与剩下的独立领域，即经济基础领域融合。这样，很明显可以看到，社会因果关系逻辑减弱了。随着三个领域的融合，现在不能再说意识形态/政治决定任何事物，因为所有的领域现在是一个整体。尼科斯·普兰查斯（Poulantzas 1973,1974,1978; Jessop 1985）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清楚地代表了这个阶段。

普兰查斯认为，国家作为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陈旧观念，将经济逻辑和意识形态/政治逻辑分离开来。他将经济逻辑进行了理论梳理，认为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原本就渗入到经济中，经济就是它们的一部分。可以认为这个新的整体就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加上经济，对普兰查斯来说，就是“经济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早些时候的假设现在非常有约束力。让主体进入独立的经济领域中是不够的，

因为这暗示着至少存在两个领域。对普兰查斯而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不让主体进入到社会生产关系中，因为政治和生产关系是单一结构性整体的组成部分。在他的理论里，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国家的政治领域（还有意识形态领域）一直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生产关系的组成和再生产中”（Poulantzas 1978: 17）。就是说，社会领域、社会地位、国家的“政治领域”，“总是”一直呈现为“生产关系”的“组成”和“再生产”，并成为它们的一部分。换种方式说，上层建筑总是出现在经济基础的构建中，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可分割。现在，由于先前吸纳了政治逻辑，意识形态领域得以不断扩展，被假定为和经济是一体的。

在普兰查斯的体系里，各个领域仍然独立，却又相互交织，且只有两两相对时才能被注意到。于是，“政治（及意识形态）关系呈现在生产关系中，后者像财产的组成关系和经济所有权一样，表现在阶级权力中。阶级权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中得到有机表达，而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则使阶级权力具体化、合法化”（Poulantzas 1978: 26）。他再次声明，政治关系“既不……仅仅是加入到既存的生产关系中，也不仅仅以绝对的外在性或暂时的结果，重新作用于自身。它们自己呈现在生产关系的组成中”（1978: 26）。意识形态不再以观念、文化、信仰，或者价值留存在上层建筑里，而是和物质性的社会关系融合在一起。这一假定，“将国家的空间扩大到意识形态机构，强调国家通过在意识形态关系中起作用，展现在生产关系里”（1978: 29）。这一点已经确定：（大写的）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呈现在生产关系中。不再是上层建筑再生产出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融合各个领域

普兰查斯是通过哪些步骤，从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合在一起的呢？他通过

下面的逻辑将政治和经济连接在一起。首先，生产关系包括“财产和经济所有权”、包括“权力发源的各个场所，场所则由生产关系进行描述”。这些权力，“作为组成性的权力，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紧密相连，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把权力奉为神圣并使权力合法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呈现在经济关系中”（Poulantzas 1978: 36）。就是说，经济关系包括权力而不包括财产，而权力以政治的形式出现。因此，在经济关系的构成阶段，存在着政治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取代了强制性国家，在阶级关系的中心，存在的是意识形态关系。

简而言之，没有政治，不可能形成经济。政治由意识形态把控，意识形态成为构成经济的关键。这三个领域正在变成一个：三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在被减弱成国家机器的三个互相依靠的分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以及经济国家机器。

“在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国家自身不再是重点：既不是历史的主体，也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对象，从其阶级性质的角度看，它是武装力量的阶级关系凝缩”（Poulantzas 1978: 119）。仔细审视一下这句引语。国家自身并不存在，它也不是阶级借以利用的事物。它是阶级力量赖以出现的方式。因此，阶级作为力量仅存在于国家条款和国家关系中。基于此，在更深入的理论逻辑层次上，经济基础，只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存在或表现自己。如果国家在第一阶段就建立了阶级统治，那么就不是经济生产关系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关系造成了阶级统治。这样，社会阶级划分，现在成为国家怎样构建阶级，以及在什么地方构建阶级的产物。

社会因果关系不断减弱

下文阐述该理论的关键性逻辑发展。上层建筑确立生产中的统治关系，源自生产力的阶级决定作用消失，导致自由浮动的社会构成出现。社会构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由组成自身，自由建立阶级划分，而不必顾忌物质现实的外在命令或限制。如果不是物质基础，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呢？普兰查斯认为，答案在于相互的决定/不决定方式。它使一个领域产生另一个领域，互为因果，反而完全没有因果性可言。“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都建立在同样的领域上，并且，由这个同样的领域决定他们的相互关系”（Poulantzas 1978: 117）。

统一体。不是一个领域决定另一个领域，那会保持各领域的分离。随着差异的不断消失，不仅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差异，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差异，因果分析开始减弱。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都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决定生产关系。普兰查斯确信这三个领域两两相互决定，所以，原先的决定模式被削弱。这对打破意识形态的因果关系非常重要，既然每个领域都可以决定其它领域，事实上就已经不存任何原因了。

普兰查斯对比了他和“工具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分别对国家的看法。“工具主义者”将国家看作资产阶级工具，“国家主义者”将国家看作外在和独立的整体，这说明各领域间是相互决定的。两种立场都假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而普兰查斯想将两者融合起来。虽然，不是融合得使经济领域消失，因为那会成为纯粹的国家主义；也不是融合而由经济来控制一切，因为那会成为纯粹的工具主义/经济主义。两者都存在，然而没有一方可以决定另一方。它们一起组成“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组成“由物质性浓缩而成，具有阶级关系力量的国家”（1978: 130）。

这种“两者作为一体”的立场，在关于国家内部划分的描述中也可以见到。普兰查斯认为，政治差异就是经济差异、阶级差异。“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国家结构中的阶级矛盾（国家是一种关系）。国家凝聚了阶级和阶级碎片间各种力量的关系，正如他们以某种必要的特定形式，在国家内部表现出的自己。换言之，国家通过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阶级矛盾，分分又合合”（1978: 132）。

普兰查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合的要点对现在清楚了：否定任何一方的独立存在。

“国家不是统治阶级控制的权力要素，工具性存在（对象），”（Poulantzas 1978: 148），就是说，国家不受阶级力量影响，阶级权力既不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先验性，“也不是一个主体，拥有该阶级形成时的同等权力”，就是说，国家也不是权力的独立来源，不是利益的唯一来源。相反，“国家……是战略领地，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交织物”（1978: 148）。

这里说的是政治领域的经济“领地”或“中心”。在更根本的理论层面上，经济不只是影响政治，而被确信就是政治。“阶级斗争横扫国家并组建国家”（1978: 154）。的确，组建、包括——就是——国家。经济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是个统一体。“根本不是一个有关两个相互限制的领域或空间的问题[国家和经济]，而只是关于一个领域的问题。即使国家和经济在经验上是分开的，也只是反映了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因为]除了国家在生产关系中具体呈现出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分离从来都说明不了什么”。（1978: 167）

第四阶段：所有领域消失在话语中

索绪尔式言语和语言的后结构主义翻转，现在写进了马克思主义，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已经超越了生产的深层决定关系。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的融合，一个领域决定另一个领域的因果分析几乎消失，让位于无因果关系的社会构成理论，很少或不再具有决定性。出现的各种方式也被认为是表面行为、斗争、冲突、合并、集团以及宰制权形式的副产品。长达世纪脱离社会结构的运动，产生了一种关于社会构成的观念。这种观念几乎不具有社会性，而是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构成，不受制于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种种社会关系。与其说它构成了物质社会关系，不如说它构成了符号或意识形态关系。

最后这个阶段，走向纯粹的基于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长达百年，在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地阐述（Laclau and Mouffe 1985, 1987; Laclau 1988; Mouffe 1979, 1988）。马克思的社会构成被重新命名为“话语构成”，显然反映了符号学的假设：集体存在的本质是

“话语”，而不是社会历史关系。社会关系消解为话语关系。后索绪尔式的符号逻辑正式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逻辑。

不仅是文化或意识形态决定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文化，以“话语”的形式，本身就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式的构成成为符号构成——一种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符号不断回归的构成³。“我们必须从放弃这个概念开始，必须放弃‘社会’是构成它自身过程的奠基性总体这个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开放性，开放性是社会的构成基础”(Laclau and Mouffe 1985: 95)。社会与阶级关系一起，已经成为成熟的符号存在。其中，阶级关系被重塑为“认同”（理解为符号）关系。后结构主义从来没有好好定义阶级关系或是将其固定。“有这样一种情形，社会各组成部分不断向系统靠近，但没有最终的系统或组成部分……有这样一种结构，意义不断协商和建构，这就是我所称的‘话语’。话语概念认为社会上任何事物都是不固定的”（Laclau 1988: 254）。

因为认为“不可能有概念，比如说，‘在最后阶段由经济决定’，并 [确信] 每种认同都不稳定，都是相对的”（Laclau and Mouffe 1985: 199），所以他们必须切断和经济基础的微弱连接，必须阻止广受赞誉的“在最后一个阶段”。他们还批评阿尔都塞和葛兰西，认为他俩假定经济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原因，是不合理的。这可能暗示了固定的关系，但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中，根本不存在固定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逻辑最终在这里被打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逻辑不仅翻转了（Gramsci, Althusser, Poulantzas），而且完全消解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所有

³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 of Foucault, Derrida, and others see: Dreyfus and Robinson (1982), Leitch (1983), Merquior (1986), Norris(1987), Poster (1989), Silverman (1989). (原作者注)

组成部分都漂浮在失重的真空中，漂浮在话语构成里。一切都随波逐流，想去“证明社会组成部分所需连接的逻辑不一致，这种连接被视为理所当然。想要以不同的路径，进一步表明‘社会’不可能是理性的联合体”（Laclau and Mouffe 1985: 99）。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从攻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逻辑推理开始。“我反对这个经济观点：社会进化受单一的经济逻辑控制；反对该观点认为社会构成总体上是经济基础设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中产生的‘必然影响’”（Mouffe 1988: 90）。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构成是开放性的，“‘历史必然’失去话语相关性，退入社会领域中（上帝存在产生的影响，以自然神论的话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急剧减弱）”（Laclau and Mouffe 1985: 199）。现在，没有什么是给定的，没有什么是先验的；不存在“物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存在“经济基础”，因为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社会主体所有这些自由漂浮，暂时存在且只有偶然性的聚集物，是怎样聚在一起的？社会构成究竟怎样才能存在呢？事实上，不是通过别的任何其它东西，而是通过索绪尔的语言学逻辑，通过最具相对性的后结构主义模式实现的。

超越葛兰西

要到达这个新的高度，甚至葛兰西这个最先抛弃经济基础的人，现在也被认为做得不够，走得不够深远。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宰制权的定义“基于一个完全不连贯的定义，不能完全克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二元主义。对他来说，尽管各不相同的社会组成部分很少有认同关系——通过分节实践而获得——宰制权构成里，肯定还是存在一个统一原则，而这只能是基础阶级。因此，社会秩序的两大原则——统一原则的统一，以及必要的阶级性——并不是宰制权斗争的偶然结果，而是必然的框架结构，其中每种斗争都会出现。阶级宰制权并不是斗争的全部实践结果，而是本体论的首要基础”（Laclau and Mouffe 1985: 69）。

这种后结构主义的预设对葛兰西的反对，具体来说，是非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经济基础，社会构成的方方面面，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都表现为社会理论的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先验性。后结构主义者对语言先验性而不是言语的攻击，变成了对社会结构的先验性，而不是斗争和实践的攻击。因为社会关系里的地位不是先天就具有必然性，所以后结构主义者只想要表面运动，只想要言语，就是说，只想要斗争。

早些时候，阿尔都塞引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把它当成上层建筑的逻辑。现在，则为整体的社会构成引入了后结构主义。早些时候的符号定位理论，成为阶级的位置相关理论。如今，阐明符号地位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成为阐明阶级地位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去除阶级的中心性，去除任何社会事件的固定意义” (Laclau 1988: 249)。后结构主义者不断提到能指，将能指写入社会理论，认为社会构成从来就不固定、不封闭、不严密。“社会最终不可能存在，它是一种不可能的对象。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努力组成这个不存在的对象，或不存在的秩序” (1988: 254)。语言学的言语重述成了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社会构成的统一性，是政治构想的产物，反过来成为产生宰制权构成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Mouffe 1988: 90)。不存在深层结构、不存在语言、不存在社会生产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其它关系。阶级和社会主体，不再和生产关系的利益产生联系，而是通过自我行动和自我定义来获得认同，获得利益。因为“执行宰制权任务，它们转变了阶级认同：内外之间固定的界限消失了” (Laclau and Mouffe 1985: 58)。

再进一步，超越阿尔都塞

下一个要推翻的是阿尔都塞。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索绪尔模式，也被认为在理论上是不完备的。因为维护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独立性，主体进入社会关系受到质疑。20世纪后半叶，什么为反对深层结构决定论，贯穿在人文科学中的？什么运动，接近表面演出，

具有叙述性，具有时刻都在的历史偶然性。引入的语言学逻辑，意味着不断回归能指的后结构主义逻辑，成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严密的社会构成。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消除使国家机器过于固定的结构，因而，结构被表面演出的角色和斗争者所取代。这类似于后结构主义能指的表面演出：时而结合、时而再次结合；时而反对、时而统一；时而一致、时而分裂；时而以宰制权形式出现、时而又以反宰制权形式出现。

由于对任何结构的信心都在不断丧失——不管是语言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马克思和索绪尔都太有“结构性”，太过于固定了。“要是工人阶级，作为宰制权代理人，能够顺利表达民主诉求，能够参加斗争，原因也不在于任何先验的结构优势，而在于这个阶级的政治主动性”（1985: 65）。充分了解他们说了什么：阶级认同是因为人们如是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就是那个阶级。阶级地位、社会地位、真正的地位，都是一种认同假设，是一种通过执行适合该主体的项目，而像那个主体一样进行的表演。“因此，根据阶级地位，某种宰制权构成实实在在得到表达，仅在这个意义上，宰制权主体才是阶级主体”（1985: 65）。

这一立场引出下面这个问题：社会利益的基础是什么？受到哪些其它因素的影响？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现在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因为利益现在是符号性的——认同——而且，是通过实践面对面地建立起来的。“‘利益’是社会的产物，并不独立于承担者的主体意识而存在，……[因为]我们不是批判‘利益’这个概念，而是批判人们对利益的对象性特征的假定”（1987: 98）。或者，说得更清楚点：“利益从来都不会先于提出和构建它们的话语而存在；不能用利益来表达经济层面上已经存在的地位”（Mouffe 1988: 90）。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此，已经不再争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有任何互动。任何固定关系，不管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还是在它们自己内部，都已经和具有自觉意愿的行动——“偶然性”——交织在一起，任何形式的固定关系都不复存在。对这一论断的扩展，就是认为不再有任何决定性的逻辑，而只剩下偶然性。决定性的逻辑消解到各种各样多元的

社会主体间，以斗争、联盟、缔约、订协议、取得一致看法或者表达述求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事实上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霍布斯世界，占据中心的不是自我最小化者，而是装满符号的社会粒子——“社会主体”——不必有来源，不必经过社会生产关系之锚和物质现实相连。秩序、认同和利益都只来自宰制权联盟和反宰制权联盟的“重新组成”。因为起于“主动性”，而不是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体构成了社会符号结构，社会构成变成话语构成。

消解社会构成

出现话语构成之前，必须从理论上打破社会构成。首先，重复目前为止大家熟悉的论断：经济是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形成的，因此，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我们将试图证实经济空间是作为政治空间而被建构的” (Laclau and Mouffe 1985: 76-77)。既然经济属于政治，下一步就是消解经济的内部结构。

理论上的解决方法以政治控制的形式出现，暗示着反抗、斗争及作用-反作用。还包括了这一结论：经济基础不能决定上层建筑，因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一步在普兰查斯早期的论断中可以找到。为使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其运行规则必须严格具有内生性，排除所有因政治或其它外部干扰产生的不确定性——否则，构建功能就不能仅仅指向经济” ((Laclau and Mouffe 1985: 76)。也就是说，为了让经济基础决定论能够运行，必须让它完全不依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购买劳动、用工资关系定义阶级，都是不够的，因为阶级仍然注定受到剥削。“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必然剥削劳动” (Laclau and Mouffe 1985: 78)，需要“控制”。他们假定购买的劳动力，即经济基础，真的是经济基础，被用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他们还认为必然存在着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这些部分以政治因素、控制力、意识形态因素、工人意识以及反对

控制等形式出现。“事实是，一旦劳动力被购买，可能劳动就会被最大限度地剥削。因此，劳动过程不可能离开统治关系而存在” (1985: 79)。换句话说，经济不能离开政治而存在。因此，经济无法决定政治或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经济自身的组成部分。“既然工人能够从事社会实践，那么他完全可以反抗强加其身的控制机制，强迫资本家使用其它技术。因此，这不是纯粹的资本逻辑，决定劳动过程进化发展的资本逻辑；劳动过程不只是资本实施统治的地点，还是斗争场所，[因此]‘工人’斗争，这样理解的话，很显然不能用资本主义的内生逻辑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内生逻辑[指的是]……生产力是中性的，其发展可以认为是自然而非线性的。而这样理解，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1985: 79-80)。

如果根据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假定阶级不是阶级，那么物质利益从何而来？就是说，如果利益不再有历史性、不再有对象性、不再有物质性，那它还剩下什么？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现在融进了由斗争和自我主动性产生、自由漂浮，且乱七八糟的联盟世界和社会认同中。“阶级认同是宰制权构成中的自我表达形成的。因此，阶级认同，只不过具有相关性而已。而这一体系已经不再固定，不再稳定——因此使宰制权实践变得可能——每种社会认同感都不断得到认可。‘最后’的密实阶段还是没有到来” (Laclau and Mouffe 1985: 86)。后结构主义阶段。每种社会认同都不断得到认可。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语言学之源是显现的。“‘国家’或‘观念’不会成为自足的认同，而是成为索绪尔意义上的‘差异’，唯一的认同建立在与其它差异的关系上，比如说‘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 (1987: 90)。

阶级关系就像索绪尔的符号关系，符号完全战胜了物质。在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构成里，在“表达的话语整体里……每个组成部分拥有一个不同的位置” (1985: 106)。注意，不是阶级，不是政治地位，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也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符号地位，因为“……所有价值[阶级和集体认同]是对抗价值，只由它们的差异来定义” (1985: 106)。纯粹就是索绪尔。请记住，我们不仅仅只是面对能指和符号，而是面对阶级、集团、党派、组织和机构。

此外，还请注意该假设对因果关系的影响。所有必然联系都消失殆尽。“因此，必要性不是来源于从根本上可以理解的原则，而是来源于结构位置体系的常规性。在此意义上，没有任何关系是偶然的，或者外在的。因为，构成关系的组成部分，其认同是由关系外的因素来说明的” (1985: 106)。

但是，如果组成部分、关系或者认同本身就是阶级，那会怎样呢？如果阶级不是由与物质生产的连接来定义的，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各个阶级都只是由系统在其内部进行定义，那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从阐释学上讲，社会构成已经封闭了。人类劳动，在生产中与自然互相影响，却不被允许同社会构成相互作用。失去了同自然的连接，同社会外部物质世界的连接，社会体系飘荡在时空中，不断以共时的方式排列、组合、结合、再结合。没有一个体系和这个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还有关联。而这个封闭的符号系统中的成员，事实上必须通过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物质化的生存和再生产。“要是分析一下所谓的非话语性复合体——机构、技术、生产组织等等——我们只会发现，对象间的地位差异，构成了它们或复杂或简单的形式，这些形式并不一定由构成他们的外在系统形成，所以，只能被看作话语表达” (Laclau and Mouffe 1985: 107)。

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当“技术”和“生产组织”，比如公司、农场、大庄园、跨国公司、集体农场、封建庄园，或者狩猎采集亲属系统等，不是“兴起于系统外的必然性”，则它们在物质世界的根、它们与自然生产力的连接和相互作用都将不复存在。它们成为四处漂浮的社会形式。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前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得以回归。

这个结局不可避免。如果系统能将自身组成对象，除了自我因果，不会再有别的因果关系。“这让我们可以克服那些表面上看上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要是国家、观念、生产关系等具有完全不同的认同，它们每一个的存在都将关联到其它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没有必要用关于某个组成部分的因果理论取代另外的理论”

(1985: 90-91)。因此，“放弃话语性/附加的话语性这种二分法，就是放弃思想/现实的对立”

(1985: 110)。确实如此。纯粹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里，对现实的想法和现实本身不再有差异。

结论

20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社会结构知识领域（物质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重造，成为话语构成。阶级关系重新理论化为符号主体关系，受关于符号差异的语言学逻辑控制。如果这是一次欧洲转向，那么也存在一种脱离社会结构理论的英美转向。英美转向脱离社会结构，但并不是向上靠近文化，而是向下行，成为扮演者、选择者、抉择者和独立者的个人主义，成为理性选择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分裂成符号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和前社会学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在蔑视社会结构。这种蔑视已经蔓延到整个人文学科中。为什么 20 世纪末，社会结构理论化遭受了巨大失败？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但有几种可能的答案。

最普遍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没能（1）解释西方工人阶级和改良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行为；（2）没能在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权时，成功进行社会实验；（3）没能充分解释性别、种族、生态/环境等这些“新的社会运动”。很显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但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没能提出新的唯物论？为什么没有出现关于人类社会结构的新理论？相反，为什么放弃了结构，走向了语言学/话语模式的理想主义，走向了非社会学个人主义，走向了理性选择？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可能这一思想运动和更大的变化有关。

社会学理论 100 年的统治可能就要结束了。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后期社会学解释——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看待世界的普遍模式，及看待人类集体问题的模式。社会关系——生产中、政治中、民众联合组织中的——组成了人类集体交往的理论中心。对于社会结构的信心——马克思式的，涂尔干式的，韦伯式的——现在仿佛都破碎了。

各种范式汹涌而来，常态科学紧随其后进行攻击，直到最后只剩下常态科学。早先社会学理论之浪，在 19 世纪末期，20 世纪早期有自己新的继承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新韦伯主义者），但它现在，从另一种范式的浪潮来看，后继乏人，因为缺少可称经典的作品，以及同样重要的知识吸引力。

很可能，理论范式的变化的浪潮，和社会变化相关，而社会学理论和工业及民族革命形成的现实相关。世界在变化，不断会出现“新的这个”、“新的那个”。同时，极有可能，另一波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的理论范式——不是关于理念的理论，不是关于结构化的人类生活的话语——不是符号学/阐释学/意义的分析，或话语分析（虽然对理念领域来说这也很好）——而是关于缠绕人类，使人类陷入全球关系网的理论，即将来临。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伯吉森（Albert Bergesen），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著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The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1983）、《浅文化之死》（*Death of Shallow Culture*），编著有《现代世界体系》（*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原文题为 *The Rise of Semiotic Maxism*. 原刊载于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Spring, 1993, 36(1), 1-22.